

#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与 主观幸福感研究

邵雅利,傅晓华

(福建江夏学院 社会心理研究所,福州 350108)

**摘要:**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 439 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较少,主观幸福感也较低,为“相对不满意”。不同性别、婚姻、年龄、月收入、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女性、已婚者、80 后、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上者、月收入在 1500 元以上者,这类人群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显著高于其他类人群;女性、已婚者,这类人群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其他类人群。同时,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性别、婚姻是预测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有效变量。为此,建议企业应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社区应完善公共服务,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支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应不断学习,提升利用社会支持的综合素质。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工会组织;社区服务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4)04-0008-08

## 一、问题提出

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城乡统筹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第一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在当代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新生代农民工已然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要部分。据 2013 年第 2 期《新民周刊》,我国现阶段 1980 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务工者总数约有 8487 万人,占外出务工者总数的 58.4%<sup>[1]</sup>。为此,本研究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视角出发,探讨他们的社会支持及主观幸福感现状,深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现状如何作用于主观幸福感,力求让人文关怀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也为实现党的十八

---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FJJKCG13-143)

**作者简介:**邵雅利,硕士,副教授(E-mail: xchouchong@163.com)

大提出的“解决农民工问题从人文关怀走向制度设计”的目标提供切实的依据。

## 二、研究设计与操作化

### (一)研究对象

采用以行业为配额的分层抽样法,选取福建省福州、厦门、泉州三个农民工集中的城市,在工业集中区、工业区的商业区以及建筑工地等场所,随机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即1980年后出生、16周岁以上且农业户口的农民工。

### (二)量表的使用与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取调查人员讲解指导、农民工当场填写并回收的方式填答问卷。测量工具:(1)《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肖水源修订,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3个因子共14个项目。分数越高,表示社会支持越高。该量表总分重测一致性 $r=0.91$ ,各条目重测一致性为0.88-0.93,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sup>[2]</sup>。(2)《主观幸福感问卷》,美国伊利诺大学的Diener教授编制,包括生活接近理想、生活条件好、生活满意、得到重要东西、肯定人生道路5个项目。用Likete式7级评分,项目分之之和为总分,分数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该问卷的重测信度 $>0.80$ ,内容效度 $=0.60$ ,校标效度 $>0.50$ <sup>[3]</sup>。在数据处理上,本文采用SPSS19.0进行统计处理。

### (三)样本特征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450份,收回有效问卷439份,有效率为97.6%,调查样本以男性为主(占54.9%)、80后居多(占63.3%)、未婚的居多(占58.3%);在文化程度上,大专以下占了绝大部分(初中学历和高中学历分别为41.7%和37.8%);在收入上,以月均工资1500-3500元为主(其中,月均工资在1500-2500元的占36.4%,月均工资在2500-3500元的占33.5%)。其基本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汇总表

	变量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	241	54.9
	女	198	45.1
年龄	90后	161	36.7
	80后	278	63.3
婚姻	已婚	183	41.7
	未婚	256	58.3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44	10.0
	初中	183	41.7
	高中或中专	166	37.8
	大专及以上	46	10.5
月收入	1500元以下	48	10.9
	1500-2500元	160	36.4
	2500-3500元	147	33.5
	3500-4500元	53	12.1
	4500元以上	31	7.1

### 三、研究结果分析

#### (一)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度现状

表 2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度均值

	平均分 (M)	标准差 (SD)
客观支持分	7.08	2.44
主观支持分	20.49	4.64
对支持的利用度	7.56	2.07
社会支持总分	35.13	7.44
主观幸福度	19.42	6.08

由表 2 可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总分为 35.13,明显低于崔澜骞、姚本先在北京、深圳、西安、合肥四个城市的调查结果(37.58±6.09)<sup>[4]</sup>。在主观幸福度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度仅为 19.4,为“比较不满意”的程度(20 分为“一般”)。

#### (二)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度在不同个体特征上的比较

表 3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度在不同个体特征上的差异比较

	变量	客观支持分	主观支持分	支持的利用度	社会支持总分	主观幸福度
性别	男	6.98 ± 2.44	20.17 ± 4.79	7.28 ± 2.11	34.44 ± 7.64	18.56 ± 6.46
	女	7.72 ± 2.44	20.86 ± 4.44	7.90 ± 1.97	35.97 ± 7.13	20.47 ± 5.42
	T 值	0.956	1.550	3.163**	2.158*	3.319**
年龄	90 后	7.32 ± 2.51	21.10 ± 4.56	7.46 ± 2.19	35.88 ± 7.65	19.56 ± 6.04
	80 后	6.68 ± 2.26	19.42 ± 4.61	7.73 ± 1.82	33.83 ± 6.90	19.17 ± 6.15
	T 值	2.680**	3.702***	1.350	2.797**	0.643
婚姻	已婚	7.86 ± 2.57	22.28 ± 4.57	7.63 ± 2.04	37.77 ± 7.40	20.53 ± 6.12
	未婚	6.53 ± 2.19	19.20 ± 4.26	7.51 ± 2.09	33.24 ± 6.89	18.63 ± 5.94
	T 值	5.824***	7.233***	0.602	6.573***	3.272**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6.20 ± 2.97	19.45 ± 5.87	6.57 ± 2.43	32.23 ± 9.54	17.95 ± 8.10
	初中	6.95 ± 2.23	20.21 ± 4.59	7.42 ± 2.03	34.57 ± 6.95	19.45 ± 5.82
	高中或中专	7.33 ± 2.28	20.80 ± 4.22	7.90 ± 2.00	36.02 ± 6.99	19.45 ± 5.93
	大专及以上	7.61 ± 2.72	21.43 ± 4.89	7.85 ± 1.73	36.89 ± 7.89	20.57 ± 5.29
	F 值	3.408*	1.849	5.619**	4.333**	1.403
月收入	1500 元以下	7.32 ± 3.06	19.71 ± 5.60	6.52 ± 2.24	32.96 ± 9.62	17.67 ± 6.06
	1500-2500 元	7.18 ± 2.37	20.56 ± 4.29	7.78 ± 2.04	35.53 ± 6.99	20.27 ± 5.98
	2500-3500 元	6.94 ± 2.31	20.02 ± 4.75	7.58 ± 1.88	34.54 ± 7.19	19.78 ± 5.80
	3500-4500 元	7.19 ± 2.23	21.40 ± 4.26	7.62 ± 2.26	36.21 ± 6.63	17.25 ± 5.11
	4500 元以上	7.65 ± 2.70	21.94 ± 4.61	7.81 ± 2.10	37.39 ± 7.70	19.77 ± 8.07
	F 值	0.881	2.000	3.704**	2.388*	3.714

注:\*\*\*p < 0.001, \*\* p < 0.01, \* p < 0.05, 下同。

数据表明,不同性别、婚姻、年龄、月收入、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社会支持、主观幸福度均有显著性差异。这与刘电芝<sup>[5]</sup>、崔澜骞等<sup>[4]</sup>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1.从性别上看,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社会支持总分和主观幸福度均存在显著性的性别差异,即女性高于男性。可见,女性体验到了更多的社会支持,她们的幸福感也更

强一些。

2.从婚姻情况看,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总分三个方面均高于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同时,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也体验到更强的主观幸福感。

3.从年龄上看,80后农民工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总分上均显著高于90后农民工,但80后与90后在主观幸福感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他们的幸福感都偏低。

4.从文化程度上看,新生代农民工在客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进一步的比较发现,文化水平在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明显高于文化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的人群。但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并没有存在不同文化程度的显著差异。

5.从月均收入情况看,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对支持的利用度、社会支持总分以及主观幸福感上均明显低于月收入高于1500元的人群。这一结果与李静、郭永玉总结出的“收入与幸福之间的曲线关系”比较一致<sup>[6]</sup>。

### (三)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个体变量及社会支持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本文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在各个解释变量中,性别(男为1,女为0)、婚姻(已婚为1,未婚为0)、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等都转化为虚拟变量,社会支持变量(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则是以连续变量进入模型,由此进行Linear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表4 进入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回归方程的Linear回归分析结果

	R	R Square	F	B	Beta	T
方程模型	0.784	0.82	24.806			
常数		.3		9.570		6.636***
主观支持				.318	.062	5.133***
对支持利用度				.541	.140	3.860***
性别				-1.359	.547	-3.484**
婚姻				1.619	.511	2.732**

注:p>0.05的回归结果均未列入表中。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性别、婚姻是预测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有效变量,模型的正确预测率为38.2%。具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感知到的主观支持越多,其幸福感就越强;自身对支持的利用度越多,其幸福感也越强。同时,相对而言,女性的幸福感较高,已婚者的幸福感较高。

## 四、结论与讨论

###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较少,主观幸福感也较低

#### 1.新生代农民工获得的社会支持较低,主观幸福感处于“比较不满意”水平

虽然国家层面上很重视“三农”问题,但中央的政策支持落实到地方需要时间和智慧,如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创业等优惠政策目前仍无法完全执行到位,这就令新生代农民工能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水平低于中央实际的政策支持<sup>[7]</sup>。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比他们的父辈文

化水平高一些,但从社会比较和社会分层的角度看,他们比社会中上层群体所能拥有的经济、政治或文化资源要少得多,他们仍是弱势群体,因而,他们自己能主动争取到的社会支持也就比较少。另一方面,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较小,社会阅历浅、心理脆弱等自身问题也进一步增加了其挫败感,因此其主观幸福感就偏低。然而,如果这种不满的情绪累积,久而久之,将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sup>[8]</sup>。

2.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月收入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性差异

性别因素对幸福感及社会支持的作用显著,女性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比男性多,她们的幸福感也更强一些。这可能与社会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关,我国传统文化赋予男女的社会角色有所不同,女主内男主外。在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青年阶段,男性的人生定位是做事业和建功立业,而女性则更多地定位于家庭和相夫教子。由于角色期待的不同,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人生目标的实现难度更高,更需要积极努力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在幸福感方面,男性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他们可能达不到社会赋予的期望,自然他们所能感受到的幸福感水平就更低。

从年龄上看,80后农民工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显著高于90后农民工,但80后与90后在主观幸福感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他们的幸福感都偏低。这主要是因为90后农民工比80后农民工较迟步入城市工作,历练少,社会交往面窄,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片面性和不确定性,所积累的经济、政治或文化资源少,同时对国家和地方农民工优惠政策的了解和利用也少。而80后农民工逐渐适应城市的生活和工作,其工作能力获得提高,能运用的社会资源增多,自然他们能感受到的社会支持也就增加。在幸福感方面,无论90后还是80后,都需要在社会中下层位置艰苦奋斗,希望能改变自己的生活面貌,因而他们的主观幸福感相差无几。

从婚姻状况上看,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的社会支持及其主观幸福感均高于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这种情况与我国重视家庭的传统有关。家和万事兴,和谐的家庭是新生代农民工在陌生城市打拼的重要精神支持和动力。婚姻使他们爱和归属的需求有了着落点,家为他们缔造了在外艰辛奋斗的避风港,这就使得已婚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水平高于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同时,男女双方的结合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面得以拓展,因而婚姻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获取更多的社会支持。

从文化程度看,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明显高于文化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的人群。张羽等<sup>[9]</sup>的研究结果也很好的印证了这一点: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得到满意工作,还可以提高控制感,能更好地获得婚姻和其他形式的社会支持。

从月收入水平上看,月收入低于1500元的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最低。根据2013年福建省最低工资标准规定,厦门1320元、福州和泉州均为1170元,对于月收入只达到最低工资标准的那些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甚至享受不到最基本的医疗、社保、失业等保障,生存状况堪忧,因而其获得社会支持当然就最低。在幸福感方面,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即收入水平偏低的新生代农民工,物质基础仍然需要努力才能满足,而对于

找到稳定工作、负担医疗费用和养活一家老小等方面,又存在很多担心和焦虑,从而影响了他们幸福感。

## (二)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性别、婚姻是预测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有效变量。

### 1.主观支持与对支持利用度对预测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作用

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个体主观幸福感。相反,如果个体缺乏社会支持,社会关系就容易出现疏离和孤立,从而导致主观幸福感低。每个农民工可能面临各种不同的压力,他们通过社会联系产生的主观感受和对客观的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也不同。新生代农民工获得了来自于家庭、朋友、邻居、同事、企业、工会、社区、社会等直接的或间接的支持,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可见的客观支持,这些客观支持需要让他们在情感上能够感受到,并由此转换成可以体验到的支持。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在情感上能感受到他们能获得社会支持,受他人尊重。可见,来自于主观感受的支持,可以缓冲外界压力对新生代农民工身心状况的消极不良影响。然而,有些新生代农民工可能感受到获得支持,却拒绝寻求他人、社会的帮助,或者是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外界的支持,这样的情况就体现了他们可能不善于运用社会支持来帮助自身。因此,为农民工提供多层次的社会支持,尤其是让新生代农民工亲身感受到主观支持,给予他们尤其是生活困难农民工以更多的心理关爱和精神扶助,并且引导他们合理适当利用这些社会支持,这些将可以大大提高他们的幸福感。

### 2.性别、婚姻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作用

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女性的幸福感较高,已婚者的幸福感较高。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多的主观幸福感和满足感,这在我国学者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也有相似的研究结果。不少学者采用性别社会角色理论进行解释,即男女在社会中的角色在情绪体验上有很大的不同,女性角色被允许有更多的情绪表达,而男性角色则很少强调情绪表达。这样,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接受态度,并相信自己的极端情绪反应会被社会认可<sup>[10]</sup>。这些差异引起对他们幸福感的判断不同,因此,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主观幸福感。

是否已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作用明显。新生代农民工渴望成立家庭,家庭可以给他们提供安全感和归属感,因而应从心理意义上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建立强烈的家庭心理归属感。这对于社会及企业如何尽量提供更丰富的交往联系,从而促进农民工的和谐稳定具体重要的启发意义。

## 五、应对策略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国家、社会、企业、个人各方达成共识,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并进行相应的整合。

### (一)企业应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

企业等用人单位应消除城乡歧视,促进同工同酬,给予新生代农民工足够的尊重。特别应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关心新生代农民工在实际生活中的困难和需要,营造良好的企业环境。

农民工工会不能只是走走过场,做做表面文章,而应该发挥其维权和组织职能,一方面尽快解决那些损害新生代农民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开展丰富多彩的业余活动,扩大他们的社会交往空间。此外还应该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成立心理咨询服务室,对心理有问题的员工积极进行开解和疏导,建立心理危机预防体系,关注高危人群心理问题,预防其引发安全事故等危机事件。

### (二)社区应完善公共服务,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支持帮助

社区是新生代农民工聚居的地方,也是大量社会资源指向的地方。建立新型社区,积极引入专业社会工作,以其独特的理论、价值观念、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确实将新生代农民纳入社区管理体系之中,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sup>[11]</sup>。社会工作者在这里承担着启发催化、支持鼓励、协调联络的角色。他们不仅要提高农民工自身的素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要针对农民工被排斥感、边缘感的心理问题,成为一个倾听者、一个支持者、一个很好的建议者,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在可能的情况下自立自强、克服困难,实现助人自助。

### (三)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应不断学习,提升利用社会支持的综合素质

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只是被动依靠来自政府与组织的社会支持,更应该努力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实现其城市融合的内生型转变<sup>[12]</sup>。首先,必须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冲破已有的熟人交际网络限制,主动热情地融入到陌生人社会关系网之中,拓宽人际交往的范围,构建以信任为基础的人际交往模式,以获得更为丰富的社会资源。其次,应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到所在社区与城市的建设中,在此过程中,不仅能够增强个人的素质与修养,而且能够提高自身对所在社区、城市的归属感。再次,还应利用各级政府和社会团体所提供的服务平台,了解各项法律、政策,以增强自身的知识及素养。通过这些服务平台帮助自己获得较好的教育、培训与技能、知识证书的机会,从而提高自身的经济地位和在职业分层体系中的等级。

## 参考文献:

- [1]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EB/OL]. (2010-06-21). <http://www.news.xinhuanet.com/politics>.
- [2]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127-131.
- [3] Ed Diener E,Emmons RA,Larsen RJ,etal.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scale [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1985,(49):71-75.
- [4] 崔澜骞,姚本先.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研究[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4):41-44.
- [5] 刘电芝,马前广,杨会会.农民工社会认知状况的调查研究[J].心理科学,2008,(6):1373-1376.
- [6] 李静,郭永玉.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及其现实意义[J].心理科学进展,2010,(7):1073-1080.
- [7] 卢玮.农民工的就业排斥问题研究[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3-17.
- [8] 曾思康,蓝淑华.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探析[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8-51.
- [9] 张羽,邢占军.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综述[J].心理科学,2007,(6):1436-1438.

- [10] 戴家隽, 贲智勤. 主观幸福感研究进展[J]. 交通医学, 2008, (5): 564-569.
- [11] 黄川粟. 专业社会工作嵌入社区公共服务研究[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4): 24-28.
- [12] 张春华.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4): 71-73.

责任编辑: 梁 雁

## An Study on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Migrant Workers of New Generation

SHAO Yali, FU Xiaohua

(Institute of Social Psychology, Fujian Jiangxia College,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this paper carries out the survey on migrant workers of new generation. The analysis of the empirical study finds that social support to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s low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low as well. The result of survey is "relatively not satisfied". For the migrant workers of different gender, marriage, age, income, degree of schooling, the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different. At the same time, subjective support, support exploitation degree, gender, marriage is effective variables to predict the new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refore, enterprises should play the role of trade union organizations and expand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social interaction. Community should improve the public service and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should continue to learn and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using social support.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social support; subjective well-being; workers' union; community service